

# 历史学是包含文学性的科学

李红岩

[摘要] 历史是史学与文学的共同对象与主题。文学重在表现历史真实，史学则既要再现历史事实，也要表现历史真实。事实与真实、再现与表现是厘清史学与文学关系的核心概念。史学内在包含文学，但史学并不因此失去客观性与科学性，历史真实的概念归根结底是成立的。

[关键词] 真实 事实 表现 再现

[中图分类号] K09 [文献标识码] A [文章编号] 1000-7326 (2009) 03-0017-03

近代以来，在各色人等的激辩中，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似乎成了一件永远纠缠不清的葫芦案。其实，至少在理论上，它们的边界还是比较清晰的。

历史是一切属于社会而不仅仅属于自然界的领域的集合名词，所以，历史（geschichte）是史学（historie）与文学（literatur）的共同对象与主题。但是，文学重在表现历史的真实（即使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作品），史学则既要再现历史事实，也要表现历史真实。因此，要辨析清楚史学与文学的关系，首先应该明确事实（sache）与真实（wahrhaft）、表现（ausdruck）与再现（reproduktion）的关系。

就主干而言，历史研究是重建历史事实的过程，历史写作则是表现历史真实的过程。所以，海登·怀特说，历史研究的过程属于科学，历史写作的过程属于文学。但是，怀特轻视了一点，即史学文本是再现史实与表现真实的统一体，亦即所谓历史与逻辑的统一。即使历史写作的过程可以纳入文学范畴，这种写作也是受史实约束的，无法脱离研究过程而单独进行。因此，尽管史学文本在局部上可以具备文学性，甚至成为文学作品，但在整体上，它必然依旧是科学制品。即使将史学文本的文学因素与属性引申到认识论，也无从完全否认史学文本的客观性。史学文本的客观性可以损之又损，但永远不会是无，永远不可能成为所谓“虚构的修词学构造物”。<sup>[1]</sup> (P2,13,16,146,181 注六,340,370,376,378,400) 这是史学文本的内在结构所注定的。

现在，许多人一谈到史学与文学的关系，立即依据史学文本的文学性去否认历史著作的客观性，进而否认“历史真实”概念，这在认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。因为客观性永远是史学文本的基础与前提。重建、重构、再现以及表现史实的过程，尽管不免失真或走漏，却又是接近与触摸客观性的过程。真相在真实的筛空中走漏，也在真实的筛空中呈现。另一方面，为维护客观性，许多史家总是极力撇清史学与文学的干系。如有学者写道：“文史要分，而且要严格地分，要把历史作为科学与文学分得清清楚楚。历史是科学，它根本不容许有任何一点浪漫主义的色彩，也不容许像写实主义文学那样来写作。”<sup>[2]</sup> 这同样得不到理论与实践的支持。史家在制作史学成品的过程中，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各种文学手法，这已经成为无须再去论证的定论。但是，就像柯林武德等人早就指出的，无论史学家怎样运用小说家的思

作者简介 李红岩，《历史研究》副主编、研究员（北京，100720）。

维与创作手法，都必须使其所构造的画面在具体时空中定位，使其处在各种关系的一致性中，必须有相关的证据作基础。<sup>[3] (P279)</sup> 因此，尽管历史写作完全可以合理想象，但所谓“创造性的想象”，不但在史学家那里不存在，而且就无法脱离现实的客观性而言，甚至在文学家那里都不可能存在。显然，天堂与地狱都只能是人间的折射。

总之，当史学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单一化为史学文本的内在结构性问题，而史学文本的内在结构性问题进而上升到认识论层面，成为对历史真实概念的强烈质疑时，我们必须从认识论的层面为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提供清晰证明。反之，我们不能为了捍卫客观性、真实性或科学性，进而连史学与文学的密切关系都不承认。

恩格斯说过，比从前所有世界观都更加唯物的世界观，是“从最顽强的事实出发”的。<sup>[4] (第2卷, P120)</sup> 他还说，“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，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”。<sup>[4] (第3卷, P469)</sup> 可见，历史写作 (schreiben) 与文学创作 (schaffen) 在出发点上就已经作了区分。现在，有学者提出，历史事实不是客观的，而是人为构建的；指出金币是金币，并没有道出历史事实；只有将金币指为货币，才道出了历史事实。换言之，所谓历史事实，只能是价值事实，不包括经验事实（或曰物理事实、生物学事实）。这种完全立足于写作终点而浑然不顾及写作起点的论点，决然抽离历史学的特性，将作为实证学科的历史学等同于逻辑演绎的哲学，或纯然创作的文学，实际是等于取消历史学科。历史学当然离不开构建。不参与构建的历史学家，从来就不存在。要构建，就必然参入文学与哲学的因素。但是，史家的构建绝非逻辑推演或形象臆造，而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，在经验事实中找出规律性。因此，无论史家笔下的历史事实经过了多少繁杂的主体过滤，归根到底，都是建立在客观性的基础之上的。既然历史事实终归具有客观性，自然地，历史事实的价值和意义也就具有客观性。当然，历史学家所构建的史实，决非恩格斯《反杜林论》所讽刺的那种“二乘二等于四，三角形三内角的和等于两个直角，巴黎在法国，人不吃饭就会饿死”<sup>[5] (P427)</sup> 之类人人皆知的大实话，也决不会以这种尽人皆知的事实去装扮真理，但是，“巴黎在法国”毕竟还是“最顽强的事实”。缺了这种人人认可的定位，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了。

我们看到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研究范围，主要集中在历史表述的文学形式上，因而几乎未去触及历史的研究过程。因此，后现代主义史学家、荷兰人安克施密特说，后现代主义史学关注的终归是历史学这颗大树的“叶子”，它其实“并不拒斥科学的历史编纂”；海登·怀特的转义学“并不必然意味着与科学和科学认知理念的激进断裂”，但它确实没有给“历史编纂的真相”以及“可证实性”一类概念留出空间。<sup>[6] (P11, 223, 228)</sup>

没有留出空间不等于原本就没有空间。无论喜欢抑或反感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想，我们都应承认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写作成品所作的文本分析，进而对史学与文学关系所作的细腻而深入的辨析及阐发，确实具有极大的启发性价值。但是，它没有也不可能推翻史学文本的客观性。后现代主义围绕历史写作所论述的那些议题，原本是我国古典史学理论家们最津津乐道的。刘知几、章学诚均是卓越的史学文本理论家。但是，客观性始终是我国古典史学文本理论家牢守的基本原则，而且经得住认识论的审视。<sup>[7]</sup>

现在的问题是，由于史学与文学在“表现历史真实”上相互重叠，因而在文学界与史学界均引起一些误解。就史学界而言，一是不承认文学同样具有史料以及历史认识的功能，因而将文学排除在史料的范围之外；二是超越文学作品作为史料的特质，误把“表现”作“再现”，从而依据文学作品去还原历史事实。其实，文学作品的史料性 (literatur 原本具有文献的含义)，主要体现在宏观方面与精神层面。原则上，“以诗证史”只能“证”历史真实，不能“证”历史事实。笔者认为，以诗证史的成功范例是翦伯赞，不是陈寅恪。原因就在于，翦伯赞“证”的是历史真实，陈寅恪“证”的是历史事实。<sup>①</sup> 另一

---

<sup>①</sup> 关于翦伯赞，参见许冠三：《新史学九十年》，岳麓书社2003年版，第424-425页。关于陈寅恪，参见拙文：《关于“诗史互证”：钱钟书与陈寅恪比较研究之一》，《贵州大学学报》1996年第4期。

方面，就文学界而言，却又总是超越文学作品的“表现”边界，必欲把文学创作的起跑点向前移，说他们也是从“再现”出发的。这样一来，在某些“历史文学家”身上，便表现出一个非常方便实用的二元悖论：为提升价值而将作品硬说成是切实的历史著作，为防止贬值又将作品退缩为虚构的文学作品。

其实，只要牢守“再现”与“表现”的边界，历史文学与历史著作完全可以相安无事。历史文学立足于表现，适当的变形不仅需要，而且还是它的职责所在。因此，历史学家大可不必指责它有违史实，历史文学家也大可不必发狠“气死历史学家”。历史著作既要再现也须表现，因此大可不必将文学的痕迹剔除干净。正如通识学人之所说，只要牢守“史必征实”原则，即使史家尽情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，拟作“历史现场”，也决非杜撰，“虽具文学兴味而不失实”。<sup>[8] (P213)</sup> 因此，问题不在于专业史家从文学的立场后退，而在于以史学的立场去包容文学。这就是前人所谓“文士不能修史、史家必须通文”的真义所在。就史学内在地蕴含着再现与表现的二重结构而言，“诗”不但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“比史来得高明”，反过来倒可以说，“史”比“诗”来得全面。

史家应该积极地去表现，不应画地为牢，局限于再现。“回到乾嘉去”的宣示之所以不当，就在于它排斥了表现。“史学碎片化”的倾向之所以不妥，就在于它沾沾自喜于再现。

基于上述理由，当史学与文学的关系讨论变成对历史学性质的追问时，笔者认为，历史学是包含着文学性的科学。因此，史学与文学具有密切关联。无论是克罗齐所谓诗歌性历史、修词学历史，抑或近代以来科学化的史学，概莫能外。要认清史学与文学的密切关联，又恰恰必须以厘清二者的边界为前提。但无论史学怎样具有文学性，它归根结底还是一门科学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参见理查·罗蒂. 哲学和自然之镜 [M]. 北京：三联书店，1987.
- [2] 李新. 文与史 [J]. 文笔·论笔·史笔 [J]. 历史研究，1984，(1)、(5).
- [3] 柯林武德. 历史的观念 [M]. 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6.
- [4]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[M]. 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72.
- [5]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（第3卷）[M]. 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5.
- [6] 参见 F. R. 安克施密特. 历史与转义：隐喻的兴衰 [M]. 北京：文津出版社，2006.
- [7] 李红岩. 中国古代史学文本的理论与实践 [J]. 文史哲，2006，(5).
- [8] 汪荣祖. 史学九章 [M]. 北京：三联书店，2006.

责任编辑：杨向艳